

（二〇二〇年四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沙甸事件”：中国民族关系的血色之殇	周孜仁
【乱世人生】	肖前——人民大学“文革”中一位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陆伟国
【理论研究】	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三）	吴 思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沙甸事件”：中国民族关系的血色之殇

· 周孜仁 ·

沙甸位于云南南部红河州蒙自县，是当地最大一个回族聚居村寨，1500多户，7000多人，是鸡街公社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素以文化教育发达著称。资料记载，明清及民国时期，沙甸就出过“师爷”以上文人330多。三所清真寺和两所中阿文并授的经学学堂，先后培养出300多名阿訇。1930年代，9名中国穆斯林青年赴埃及留学，沙甸便占5席。后来成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的马坚，便是其中之一。马坚先生翻译的汉语版《古兰经》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

1975年秋，骇人听闻的军事事件偏偏在这个文化渊源之乡发生了。国家暴力假“平叛”之名，对这个回族聚居村落发起大规模进攻。对垒双方力量对比非常悬殊：一方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另一方则仅仅是在革命传统电影中获得过初级军事知识的普通农民；一方是现代化武器：榴弹炮、机枪、步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另一方仅有为数寥寥的土制和抢夺来的长短枪支。结果毫无悬念。7月28日凌晨3点解放军发起进攻，经历7天8夜，军事行动顺利告捷。事后统计，失败方被毁民房4400多间，死866人，伤、残600余，进剿方的死伤人数不得而知。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其惨烈残酷之状，堪比一次大屠杀。这起军事冲突，史称“沙甸事件”。

文革时期全国各地均发生过规模不等、性质各异的流血冲突。一类以1966年发生在京郊昌平、大兴和1968年发生在湖南道县等地的大屠杀，其特征是：政府唆使纵容，基层策划组织，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等对“地、富、反、坏”一类“政治贱民”实施公开的集体屠杀；二是在“文攻武卫”口号鼓动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装厮杀，著名的如1967年夏天的重庆大武斗、四川新科左派大佬刘结挺、张西挺组织的“武装支泸”、1968年7月广西以落实《7·3布告》为名，由“联指派”武装人员对“4·22派”的围剿。这类事件，背后一般都有军队支持，但军人却不出面；最后一类，则是军队直接动用武力对造反群众实施镇压，如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还有1968年云南驻军剿灭所谓“滇西挺进纵队”等。沙甸事件属于第三类。

沙甸事件的特点，首先是军事对抗持续时间相对较长。长期以来，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钢铁长城”“坚强柱石”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对待军人，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绝对都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反军乱军”成了文革期间两派争斗的一项可怕的政治罪名。面对军队直接参与的军事行动，被镇压方只能乖乖受死或者投降，上述的“二·二三事件”和“滇挺事件”，从开枪到结束，都不过按照分钟来计算，而沙甸村民与军人的武力对抗，竟持续了7天8夜！直到整个村子被大炮夷为废墟方才结束；其次，“二·二三事件”和“滇挺事件”，都是局部地方军事当局下令动武，而对沙甸的军事进剿，下达命令的正是中国的最高当局；最后，这起发生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流血事件，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更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精神信仰的力量有时是很强大的。尤其如伊斯兰这种已经与回族风俗、生活习俗紧密结合的宗教信仰，一旦因某种因素触发而突破了世俗政权的既定框架，它所爆发出的负面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权力当局不得不靠军事暴力来加以扑灭。

一、关于事件的表述

先看官方的表述。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实》的表述当属十分权威：

云南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说沙甸问题“性质变了”，“政治解决已无可能”，向中共中央提出军事解决的请示，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于7月29日凌晨开始调动部队，对沙甸进行军事包围，以后对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回族群众聚居村也实行了军事包围，整个军事行动历时21天，至8月18日结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房屋大部分被毁的极其严重的后果。

中共个旧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个旧市党史大事记》也做了类似记载：

由于“四人帮”的操纵，错误认为蒙自沙甸等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武装叛乱”，发生震惊全国的沙甸流血事件。经中央、中央军委同意，对蒙自沙甸、开远市大庄、新寨等回族村寨采取军事行动，造成沙甸许多群众伤亡，沙甸、新寨的大部分房屋被毁的严重后果，政治上的损失难以估量。

民间的表述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更多伸手可触的细节。这些回忆文本，有事件亲历者、云南省委“沙甸工作组”成员周康的《骇人听闻的沙甸事件》、有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省委沙甸工作组副组长李长猛之子马黑的《父亲往事》、事件策划者之一、云南炮派领袖方向东的书面回忆、等，散见于不同网站和个人博客的回忆文稿则更多，内容大同小异。沙甸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沙甸回民领袖“三巨头”之一、后来当了沙甸党委书记的马绍美，也著有回忆录对军事进剿的全过程作了详细记录。

沙甸人的集体记忆则是刻在石头上的。事件后沙甸新建的“沙甸事件舍西德纪念碑”（“舍西德”是阿文“殉教牺牲”之意）载，死于军队枪炮的总人数为866人。死难者的姓名准确地镌刻在碑石之上。碑文称：“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碑文详细叙述了事件过程。碑文最后一句是这样的：

真主说：“为主道而献身的人，你们不要说他们死了，其实他们活着，但你们不知道”。

对于惨案真实性，各方表述大体一致，只在表述的认知角度和细节的具象深度略有差异。中共建政以来，让执政当局如此蒙羞的血案，能做到这个程度，很难得了。

二、“阶级斗争”理论的必然产物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实行稳妥温和的民族政策，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上世纪50年代是云南文艺家难忘的流金岁月，反映那年代云南少数民族生存状态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芦笙恋歌》《边寨烽火》《摩雅傣》《勐龙沙》等，脍炙人口，享誉全国，故事所表现的军队与少数民族群众间的鱼水情深，曾让无数观众深受感动。考虑到回族全民信奉伊斯兰教、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的特殊之处，政策更给予了特殊照顾，比如：将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定为回族民众的法定节日；在生活用品实行票证配额的紧缺情况下，汉族食油配给每月每人仅4市两、回族则为7市两、牛羊肉的配给量也高于汉族；回族实行土葬，遗体需白布包裹，所需布票亦给予特供，每位死者3丈至3·6丈……这些，对于融合民族关系，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可惜，随着50年代末一连串假理想之名实施的荒唐行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让当政者与少数民族的蜜月渐生疏离，尤其“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论断的提出、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继而，毛泽东再次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原来那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理所当然就被斥之为民族工作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横遭挞伐。《人民日报》1980年7月15日特约评论员《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样表述了风向的突变：“当时的批判者断言，这条路线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否认阶级问题是民族问题的实质，否认我们国家中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存在是民族问题存在的根源，否认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阶级问题、革命问题。以此为依据，给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扣上‘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斗声”日急，云南的少数民族从此难逃劫运。

沙甸作为伊斯兰文化渊源深厚的村落，到了阶级斗争如此急促的岁月，自然就成了必须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加以彻底打理的“顽固堡垒”。1965年农村“四清”，沙甸被红河州圈定为“运动试点单位”，派进工作队进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这次运动的重要成果，就是三所清真寺被全部关闭，宗教礼拜活动被全部停止。

“四清”刚过，文化大革命接踵又来。破“四旧”是文革重要的主题之一。所谓“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几乎涵盖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所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元素，按此定义，存活于回族民间、与其生活方式紧密结合的伊斯兰宗教文化和信仰自然属于扫荡之列。造反初期，沙甸确实也成立了两个“造反”组织：

“毛泽东思想大无畏造反兵团”和“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以少数年轻人为主）他们的政治宣言也和风靡内地的红卫兵同一范式，他们不仅要“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继续占领“封建堡垒”清真寺，禁止群众礼拜，还疯狂焚烧宗教经典和‘地富反坏右’家的书籍。

随着文革的演进，精神领域极左的专权之风愈演愈烈。特别是文革催生的“新生红色政权”：云南省革委会的成立，以更显合法、更加强势的霹雳手段将极左政策推向了极致。1969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主要负责人黄永胜在听取昆明军区政委兼省革委主任谭甫仁汇报时，正式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云南边疆民族工作取得的成就，称：“林副主席讲了多少次，要搞政治边防。而你们那里是礼貌边防，是和平过渡的边防”。同年3月，中央

军委转发《昆明军区关于加强边防斗争的报告》，再次批评昆明军区过去的“边防对敌斗争方针是错误的”，其时，谭甫仁为首的云南行政当局对于“政治边防”的诠释，第一，就是“深入开展以‘三忠于’为中心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其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前者指思想意识形态，后者指政治行为准则。于是，批判“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一时成为了全云南的政治主题。谭甫仁在红河州驻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座谈会上，如此明确定义：“农村问题，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边疆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他反问：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

云南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门类最多的边疆省，曾经存在于各民族之间和谐的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由此全面走上了歧路。

三、奇特的文化景观

沙甸事件的发生和演化，必须从文革初的乱局讲起。

1966年秋天，全民响应北京的号召“造反”，那时的社会状态和“四清”时候已大不相同。天下大乱，各级地方政权都在造反派的冲击之下七零八落。文革前曾经的政治高压陡然缓释，每个人都能以保卫毛泽东思想正统性的旗帜为掩护，表达各自不同的政治诉求。“四清”运动取缔伊斯兰文化风习，沙甸回民心里早积压了太多憋屈，此刻终于得以彻底释放。激进的造反派“大无畏兵团”和“红色造反队”坚持要封闭清真寺，“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而更多的回民也成立造反派来保卫清真寺，这个组织直接取名“民族政策捍卫兵团”。“捍卫团”的政治诉求理直气壮：说关闭清真寺、禁止做礼拜是“走资派破坏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阴谋，必须彻底粉碎。

沙甸人全是回族，98%的群众理所当然站到了“捍卫团”一边。他们痛批“大无畏兵团”和“红色造反队”的胡作非为，断然决定打开被“四清”工作队封闭的清真寺，正式进行礼拜。

那年月，文化革命在全中国闹闹嚷嚷，造反派都为争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统名分，大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搞“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远处西南边陲一隅的小小村落，文革主题偏偏特立独行，回民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旗帜，却是要进入清真寺，礼拜真主、诵读古兰经。用当事人马绍美的话说，沙甸“造反”的主题，就是“一场争夺清真寺的斗争”。

接下来发生的是：随着全体国人对个人崇拜日益厌倦，尤其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让毛泽东的权威广遭质疑，次年，毛不得不依靠温和派对持续多年的破坏性政策进行修补。其时，笔者供职于云南省委办公厅政策调研处，而且恰好参与民族政策落实工作。发生在沙甸以及整个云南边疆的民族情绪对立，我记忆犹新。那段时间，有一个叫马光普的河南回民（在政府文件里，他的身份被定义为“伪军官”）独自一人来到云南四处“传教”，讲话稿被整理成油印小册子，通过邮局广为寄发。小册子题名《伊斯兰真理辩证法》。如此异端思想的传播很快让当局愤怒，于是下令全省缴没。收缴的印刷品曾多有送来办公厅的，我得以看过而且记忆深切。讲稿一问一答，很富煽动性，下面凭记忆介绍片段：

问：你怎么知道有真主存在？

答：机器没有工人开，不会动；汽车没有司机驾驶，不会走；我们现在学科学，都知道地球是转动的。地球这么大，是谁有这么大的力量能把它转动呢？只有真主。

问：请问真主在什么地方？

答：屋子里飞着一只苍蝇，如果你问它，屋子在什么地方？苍蝇该怎么回答呢，它可以说屋子在上也在下，在左也在右，在前也在后。对于苍蝇来说，屋子实在太大了，可说是无所不在。同样，真主对于渺小的人类也是无比巨大，无所不在的。

问：你见过真主吗？

答：没见过。

问：既然没见过，你怎么知道他存在？

答：秦始皇你见过吗？马克思你见过吗？但是他们都存在。

.....

文革疯狂让回民的民族尊严遭遇了巨大凌辱，相应的结果，就是本已开始真心归附共产党教化的心灵，又开始重返真主的怀抱。对于后来愈演愈烈的云南回民事件，马光普滇传教是一个重要的舆论先声。

马光普离滇时曾带了两个人一起赴西北继续讲道，刚到西安即被公安抓获，马光普被押解河南，两个云南年轻信徒则被递解昆明关押。这两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沙甸的回民领袖：一号马伯华和二号郑全书。二人都死于进剿。三号马绍美在战火中得以幸存，文革破产、落实政策后，成为新组建的中共沙甸党委书记。

四、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二重复调

云南有三个较为集中的回族聚居区：滇东北的鲁甸县、滇西的巍山县和滇南的个旧（旧）、开（远）蒙（自）。1856年在大理地区曾发生了杜文秀起义（大理古城有杜文秀元帅府），史称“滇西回乱”。杜与震动国中的太平天国东西呼应，气焰极盛，一度兵临昆明城下，直到太平军南京小朝廷被曾国藩剿灭，1872年，清廷才得以调兵云南，将杜文秀彻底荡平。杜起义十余年间，汉回之间类乎种族灭绝的残杀，让滇西一带十室九空。民族仇恨在相当长的时间都难以消弭。照道理讲，此后云南回民再发群体事件，理当首先出现于滇西一带，而文革引发的回民极端事件，为什么偏偏轮到滇南呢？

我们还得继续从云南文革整体的政治背景说起。

从1966年秋天开始的云南文革，和全国一样，无冤无仇的群众分成了两大政治派别，“八二三”（简称“八派”）和“炮兵团”（简称“炮派”），进行了莫名其妙的生死搏斗，所谓“莫名其妙”，也同全国一样：双方的政治诉求完全一样，都宣称要保卫毛泽东教义的纯洁和政治路线的正确无邪。群众选择参加这一派或那一派原因常属偶然。沙甸的情况也不例外。

滇南有两座大的工业城市：个旧和开远，沙甸正好处于两城之间。“文革”以来，“炮派”势力控制个旧，“八派”势力控制开远，沙甸就成了“八”“炮”两派争夺的战略前沿。就距离而言，个旧近，而开远远，信奉伊斯兰教的沙甸村占绝对优势的“民族政策捍卫兵团”自然地归属了“炮派”。

事情的大转折发生在1968年秋天，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封疆大吏谭甫仁空降昆明。谭甫仁是1955年授衔的中将，和文革中所有全面介入地方管理的军人一样，他们特有的执业禀赋：服从和勇敢（甚至莽撞），在地方工作最容易误入歧路：他们对地方行政工作有多无知，他们施政决策的胆子就会有多大，事情就会有多糟；同样，上峰指向的前方哪怕万丈深渊，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阔步向前。

随便查看一下谭甫仁云南履新的几次讲话就够了：

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不能手软。你们革委会不能搞那么多清规戒律，束缚群众手脚，把政策交给群众，群众说是坏人，要揪就揪，要斗就斗……放手发动群众斗坏人，揪出来就斗嘛！大会斗、中会斗、小会斗嘛！白天斗、晚上斗……昆明很多单位分三班轮着搞，不能让敌人太舒服，这个好。你们不要满足抓了几个人，斗了几个人……这个权就交给广大群众，由你们自己去专政就行了。白天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每天让他睡几个钟头就可以了……

你们对敌人不能手软，要狠一点，要克服右倾思想，不要怕。有一百，抓一百；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告诉你们，当群众起来后，也可能会搞了一些好人，没有关系，搞错了就改嘛，不要怕。

（我）在个旧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990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否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也可以，下放劳动、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

至于打击对象，谭将军的立场也十分清楚，毫不隐晦：“对‘八派’就是要坚决相信、支持、依靠，有‘八派掌权的地方，要坚决支持：没有掌权的地方要为‘八派’争权。”

如此失去理性又明目张胆地选择八派作为执政基本盘，公开打击另一大派群众组织“炮兵团”，也并非谭甫仁自作主张，而是上峰有令，军人必然作此不二选择：1968年8月10日，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省革委会的批示明确定义阎红彦、赵健民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云南的代理人”。那么，闫红彦早在文革之初便自杀身亡，“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云南的代理人”就只剩一个赵健民了，而炮派正是的赵建民的民意基础。谭甫仁的军人和共产党员这两种身份，都注定不需要再花时间去作是非判断和价值判断，只需要服从就行了。

上任伊始，1968年8月14日召开的省革委会第一次全会，谭甫仁开宗明义就提出省革委主要抓好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办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第二件是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自此，以“批赵健民”还是“挺赵健民”为刚性标准的“以人划线，层层站队”自从开始。要想象这场政治瘟疫有多么残忍，只需要读一读前面杀气腾腾的讲话就足够了。“炮派”群众长达七八年灾难亦由此开始。

前面说过，崇信伊斯兰教义的沙甸人，投靠的偏偏是炮派。整肃“精神异教”和整肃“政治异教”的双重灾难重合，惨景自然更胜一筹，就如物理学上讲过的通俗例子，一队行走在木桥上的士兵，由于步伐整齐而产生共振，重力冲击桥梁，最后让木桥整体断裂。

当时滇南地区同属炮派，受到打击迫害的500多人，跑到沙甸来避难，沙甸又成了政治“马蜂窝”，“新生的红色政权”必欲除之方能后快。和当年的“四清”工作组一样，1968年12月28日，一个加强营的“支左”军人被派进沙甸。这次的名字不叫“工作组”，而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虽然沙甸回民心怀侥幸地列队夹道欢迎，宣传队还是一进村就指向明确、旗帜鲜明地宣布，要对沙甸的阶级队伍进行清理，公开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一小撮阶级敌人、牛鬼蛇神、野心家、阴谋家受国民党军统特务指使，煽阴风，点鬼火，蒙蔽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好下场”。宣传队直接驻扎进沙甸大清真寺，更糟糕的是，他们在清真寺里吃猪肉，把猪骨头丢在清真寺水井里。……

军队从来都是政治家手上的暴力工具，名为“支持左派”的革命军人竟然在回民的圣殿里大嚼猪肉，还将猪骨头扔进寺庙的水井，这些军人和宣传品上解放军这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好学生”形象，早已南辕北辙。

由这样的军人来区分善恶、主持公道显然已不可能。他们区分沙甸回民的善恶，标准已经变得非常简单：除了“以派划线”，看你属“八”还是属“炮”，还加一条更荒唐的标准：“以教划线”。他们公开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凡企图继续礼拜、把斋者，一经发现，立即批斗，游街，捆绑吊打、酷刑折磨。小小的沙甸村，竟然被揪出了“反军乱军黑干将”“宗教复辟急先锋”“赵（健民）氏小爬虫”200多人，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折磨他们的办法包括在受辱者的脖子上挂猪头，强迫他用舌头舔……1969年1月30日的一次大型批斗会上，60位回民被挂上“宗教复辟的急先锋”黑牌游街批斗，后还将他们集体押到一个厕所旁，迫他们学猪用嘴拱厕墙，学猪爬，学猪叫，戏之为“猪拱长城”：所谓长城，正是毛泽东赐给军队的美誉。还有一次，强迫50多位回民学猪滚，从10多米的高坡上横身下滚，至使一位已怀身孕的妇女“猪滚”后当天即不幸流产。

接着还有所谓“第二次土改”，评“政治工分”，凡在划线站队中“犯错误”者，都扣减工分，造成受迫害者不仅政治上受压，经济上也受到盘剥；甚至还让其他民族的民兵对沙甸140多户地富及其子女家庭进行查抄，并把其中的40多户强迫赶出，迁移附近的苗族、彝族村子实行“包夹改造”。

文革的政治高压让穆斯林的尊严和安全，可谓由此丧尽，与此同时，仇恨也在暗中熔炼，如涌动的潜流继续冲击被文革搞得千疮百孔的政治冰层，最后的爆发，只是等待一个历史的劫期而已。

五、乱局2·0版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当局能调整政策加以补救，局面也许不至于那么糟。事实上，1971年林彪事件的后续效应，历史给解决沙甸的麻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九一三事件”后的1972年，毛泽东不得不启用温和派对横行多年的极左路线进行调整。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南，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和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成了两大重要执政主题。多个少数民族的节日开始恢复、民族特供商品：服装、花边饰品、生活用品开始恢复生产……紧张气氛开始缓和。

可惜，文革这辆处于政治斜坡上的战车偏偏再次带领整个国家向深渊冲去，1974年，北京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号召好事者“反潮流”。深受压制的云南炮派，亦包括回民和其他饱受冤屈的群众，再次等来了抗争的契机。如果说1966年文革大乱，是为1·0版，那么，1974年批林批孔，掀起的大乱则属于乱局2·0版。云南政局再次生乱。笔者供职于云南省委办公厅，几乎每天都会遭遇群众的冲击和围攻，大院热闹如年街集市。这些群体有这么几拨：

- 1、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成立吃闲饭”为名被强行驱赶乡下、无以为生的城市居民；
- 2、标称为“反潮流”派、即深蒙冤屈要求落实政策的“炮派”领袖和群众；
- 3、标称为“齐向阳”派，即已经得以掌权的八派某些人，他们担心反潮流派翻身会伤害已经得到的权力。

4、标称为“大批判派”的造反派（这是文革中既未遭被清洗、亦未能获利掌权的部分群众领袖）

5、要求落实民族政策、打开清真寺做礼拜的回民；

6、文革罹害的单位或个人、要求落实相关政策者。等等。

几部分社会群体中，第一类多属老弱病残，被人蔑称为“叫花子兵团”，实不堪一击，办公厅组织了一拨机关年轻干部对进驻大院的弱势群体分而围之，教训恫吓一番，驱赶出门了事；最后一类也很好对付，如云南第二工业学校的老师，他们将双台床搬来机关大厅起居数周，要求归还文革中被某工厂非法占用的校舍。书生无暴力倾向，动口不动手，占领大厅数周，与机关干部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最后心灰意冷，灰溜溜自动撤离了；第四类虽为当年叱咤风云的草莽英雄，一看而知是为个人利益抗争，多为众人不齿。唯有第二类，“划线站队”将他们全部打入社会最底层，许多人都饱受皮肉之苦，早已失去一切，没什么可再失去了，他们的抗争很无畏，亦最能调动起广大群众的同情和响应；相比之下，第五类则战斗力最强，因为不仅“划线站队”剥夺了他们世俗生活的一切，他们的精神尊严也受到了巨大伤害。宗教信仰是超世俗、超功利的，对信仰者触发而来的力量足以牺牲自己，毁灭世界，不可战胜。正如乌托邦理想曾让许多年轻人奋斗牺牲，前仆后继。

这样，“划线站队”中遭遇的共同苦难让第二类人群（反潮流，即炮派）和第五类人群（回民）很容易结成了统一战线。云南炮兵团二号领袖方向东的回忆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这个政治结盟。

方向东，彝族小伙子，云南大学学生。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胆子大，而文革造反恰恰最需要这种品格，于是一夜之间就被潮流推上了顶峰，成为云南大学“炮兵团”一把手和云南炮派二把手，虽然人家喜欢叫他“草包司令”，可是经过文革多年历练，“方老草”照样操练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在他自己编辑出版的《方向东传奇故事》中，这样记录了他和沙甸的故事：

1974年方向东把沙甸回民的三个领袖马伯华、马绍美、郑全书从沙甸请到昆明华山东路53号方的家里来商量，怎样做才能把云南的“划线站队”告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让中央来为我们平反，才能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我们当了“反革命”被压制五、六年了！怎么才有出头之日？

在与马伯华、马绍美、郑全书商议后他们共同作出决定：把沙甸回民在“划线站队”受到的迫害，受到的民族仇视，作为云南的一个典型整理出来；写成给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报告。

这一招果然见效。方的回忆文稿继续说：“报告寄送北京党中央后，当时的副主席王洪文做了批示，要求纠正上述错误！这个批示下来之后，全省回民就发动起来了”“沙甸、文山、建水、开远数千回民要赴京上访。云南省委派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负责做工作，王必成司令员没有办法。就请方向东帮忙到开远去做回民工作，方向东到开远做了三天工作，回民提出为‘划线站队’平反的条件，王必成答复不了，回民不答应。方向东之后只好空手回昆明。第四天沙甸回民和全省回民近二千多人集结昆明，购买包下62次昆明到北京的全部火车票，要赴京告状，省委只好通知停开62次昆明到北京的火车。”

六、最后的断裂

事情的发展已经不像共产党强势政权处理异己者一贯的杀伐决断，倒有点像猫和老鼠捉迷藏。文革岁月，只要毛泽东本人不发表明确的“最高指示”，任何一方都可以宣布自己观点具有权威的教义解释，双方都可以从毛语录中找到有利自己的理论武器。“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复辟”是一方的利剑，而“落实民族政策”，则成了另一方的盾牌。

史料介绍：“1974年11月6日，红河州、个旧市、云锡公司领导组织数百名干部、职工在鸡街召开大会，“成立‘鸡街地区民兵联合指挥部’。当天晚上，指挥部以查户口为名，抓了鸡街火车站‘反潮流’人员”。接着，“11月10日，成立个旧地区民兵联合指挥部”，

鸡街和沙甸距离不过一公里，政府这些举措，傻瓜也懂，是在炫耀武力，对沙甸造成大兵压境之势。

仇恨发展到这一步，威胁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沙甸事件注定要在武装冲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马黑的回忆录说：“沙甸也以原有的民兵武装为基础，并抢夺附近武装部的枪支，相应建立了民兵团以对抗。两边冲突不断，互有死伤。”“之后，从1974年12月中旬到月底短短半个月，就发生了多起抢夺枪支弹药的事件，且双方都有伤亡，并愈演愈烈，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省革委主任周兴是来自江西苏区的老红军，解放初即担任西南公安部部长、其后先后任全国最高检副检察长，再任山东省长、云南省长、书记。漫长的血火历练，让他的信念和脾气格外地固执，面对挑衅，他表现出了近乎病态的倔犟。对于“划线站队”“回民问题”这些前任谭甫仁留下的烂摊子，他私下也满肚子憋屈，在办公厅干部面前，他曾这样多次发牢骚，说“这些馊事和我有卵子个关系”，但事关党国信念，他依旧坚强无比，关于清真寺，他坚持：“他们（回民）打开一万次，你们（指工作队）要关闭一万零一次。”

事情顶牛顶到这一步，必须得由更高层级的决策者来仲裁了。197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要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沙甸回族代表10人、红河州委书记冯治国、红河州革委政工组长曹占元、云锡公司党委书记张庆芳以及文山州、个旧市、建水、蒙自、开远、通海、玉溪等县负责人各1人（上述各地均有不同规模的回民群体事件）等，由省委领导周兴、陈康、刘明辉、王砚泉、李长猛等带队，于1975年1月3日到北京开会。云南主要党政头目和一个小小村落的回民代表将在国家最高领导面前过堂论招，新中国的历史上，算得一大政治奇观了。为了减少干扰，云南两派群众组织大佬黄兆祺、刘殷农、杨树先、李毅、方向东5人也一同领令赴京参会，后又派往开滦煤矿、包头铁路局和大寨去“学工”“学农”，一去10多个月，不让它们捣乱，回到昆明，进剿沙甸的炮火已火灭烟消。

头头都调离云南，群龙无首，想必事情会好办些了。事实却并非如此。头面人物远处京城，边疆云南依旧摩擦不断，最大的一次，即“香木桥事件”随即爆发：2月15日，建水县馆驿大队回民去香木桥双山村慰问被大队民兵揪去批斗的阿訇，回汉民兵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均有伤亡。死亡再次点燃了一触即发的引信。回民抬着尸体直接到省委上访，要求惩办杀人凶手和抗议省委不执行中央收缴民兵枪支武器的文件精神，这次上访有红河州、文山州和玉溪地区等地回民，称为第二次大规模上访。其时，笔者正在办公厅每天画卯上班，亲自目睹了这场仇恨的旋风。

笔者正好在办公室当班，听闻似有海啸来袭，只见得省委办公厅门前的国防路上无以数计的白衣白帽，步伐整齐，铺天盖地而来。他们涌进省委大院如入无人之境，直接将棺材停

放在大厅里。其时，省委主要领导已经全部上京，日常工作由分管公安工作的省委常委朱岗和办公厅主任胡延观主持。胡告诉我，他记得清楚，尸体共7具，因长途辗转运输，已经开始发臭，回民不得不同意尽快处理再说，省委方同意给出丧葬补贴，如裹尸布和香油若干。而我们则已无法继续坚持上班，只能转入“地下”：带着工作文案去弥勒寺省委二号院继续点卯，当时心情的无奈和晦暗，也是可想而知的。

云南省常委扩大会议已搬到北京马拉松一般地开：从2月到5月，共三个多月。北京最高当局主持本案的，正是以武装攻打“上柴联司”而得到领袖青睐的政治新星王洪文；还有重新上台的著名铁腕人物邓小平，他正准备大刀阔斧整顿文革搅就的举国乱局；叶剑英、陈锡练、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苏振华、吴桂贤等，亦先后三次莅会并发表讲话。讲话明确指出：“以人划线，层层站队”这个口号“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毛主席早就作了批判”“要彻底纠正”，其次，“民族工作问题上，工作中和执行政策上的缺点是严重的，有大汉族主义思想……致使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委认错不迭，并于5月29日，正式成文《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呈报毛泽东、中共中央审查批准；6月12日，省委、省革委据此联合发文《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通知》，就“划线站队”、逼供信、“对回族风俗尊重不够、在宗教问题上，企图用强制的办法，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激化了矛盾……”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检讨。

这当然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步进行的，却是会议期间的5月23日，云南省委、省革委再次决定派出工作组，由解放军协同进驻沙甸，负责“落实中央关于安定团结的方针”“抓革命促生产”；同样，沙甸百姓想到的是1968年的军队“捅马蜂窝”的历历惨祸，他们在村口集群阻拦，坚持必得北京的回民代表回来再议。军队和工作队进不了村，立马转场鸡街糖厂等地待命，随时准备进村。为加强政治攻势，当局还用飞机在沙甸上空散发“通告”，通告称，最近一个时期，沙甸一小撮人，煽动少数人抢夺和制造武器，挑起武斗·行凶杀人……继续对抗中央指示，变本加厉，为非作歹……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特派出工作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协助下进驻沙甸。不许任何人抵制工作队进村。

面对当局的恫吓，沙甸村民毫不示弱，他们把几千份“通告”收集起来，装进麻袋，由小伙子们簇拥着扛去工作组驻地——鸡街糖厂大门口，一把火烧了。

当局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6月20日，云南省委正式向中央汇报，提出了“军事包围，政治解决”的意见。同日，中央领导人接见云南省委和红河州委负责人进行紧急磋商，接下来又接见马伯华等10人，王洪文正式宣布：“如果不让（工作组和解放军）进村，就打‘土围子’了”

几个月来，沙甸回民代表文武结合、虚与委蛇，不停触探当局的决心和底线，到现在，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7月9日，马伯华等10名代表在北京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保证书，终于从北京回到了沙甸准备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沙甸问题的的批示》。只是群众的仇恨已经点燃，情绪已经失控，马伯华已经无回天之力。据个旧“一二八派”头目胡长林披露，沙甸事件结束后，被抓捕的上京回民代表之一的马灿良曾和他同囚于个旧宝丰隆监狱，马曾告诉他，其实当时马伯华知道事情已无转机，为了保住老人、小孩和妇女，只有自动向军队投降，不料马伯华的讲话竟遭到所有村民一致反对，咒骂他为叛徒。众人情绪太过激烈，以至于马伯华的哥哥不得不出面解释，说他兄弟一片苦心，绝非贪生怕死想叛变，如果大家一致决定打，我兄弟肯定带领大家冲在最前头。

云南当局已经等不得了，7月22、24日，连续向中央报告，说马伯华回去以后，抵制、对抗《关于沙甸问题的的批示》，并积极进行武装准备，因此，沙甸问题“性质变了”

“政治解决已无可能”，要求军事解决，中央终于批准了云南当局的要求，批准动用国家暴力来“打土围子”。这就有了1975年秋天发生在云南边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七、结语 物质贫困：宗教事件的世俗悲剧底色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人民的鸦片”又说：要想“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世界上无论哪一种、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宗教，从本质上讲，都是人类面对困境（物质的和精神的）等待拯救的渴望。要想解决宗教问题，从根本上讲，就必得把人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获得一种现实的幸福，这种幸福应当包括精神的，更应当包括作为精神生活基础的物质环境。

纵观云南宗教地区，极大多数是贫苦地区。笔者认识红河州水电队高级工程师张振钧老先生，文革前张振钧曾在鸡街、沙甸长期从事农村水电排灌建设工作，与沙甸的回民交往密切（“沙甸事件”“三巨头”之一的马绍美，正是他们从乡下招聘的临时工），常听回民发牢骚，说“世道不公，农民的儿子永远做农民。”“供销社来收我们的洋芋作价很低。偏不准我们挖出来拿去昆明卖”等抱怨之语。笔者与张振钧讨论沙甸事件起因，张老先生非常肯定地给出一个字的结论：“穷”。

其实，和其他落后农村相比，沙甸的经济情况本来不算太差。这儿地处亚热带腹地，雨量丰沛，交通便利，非常适合蔬菜、甘蔗、花生及油菜等经济作物生长。紧邻的鸡街镇是著名的滇越铁路和公路交汇处，离著名的锡都个旧仅20多公里，这些，都为沙甸发展多种工业、副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历史上，沙甸回民擅长手工业、餐饮和商业贩运，群众生活相对富裕，文化亦相对比其他地区发达，。

可惜，好端端的一个村子，文革前，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权力指挥棒下左支右绌，每况愈下。当权者根本不顾沙甸人多地少（人均7分地）的短板，看不到适合多种经营的强项，强令“以粮为纲”，将沙甸由经济作物区改为粮食作物区，将高产的甘蔗田、蔬菜田改种水稻，又砍掉传统的手工业和副业，群众生活的日益困苦成为必然的结果。官方的数据。文革中期1973年底，沙甸人均口粮280斤，集体分配的现金收入不到60元，最低时一个劳动日只有8分钱，许多群众不得不用野菜和树皮充饥。

更让正常人无法理喻的是，面对那样的经济困境，当时的领导偏偏将一切罪恶都归结为农村的“封、资、修复辟”，发誓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维护马列主义的正宗已然高于一切，人类生存的正当欲望却被视为异端。“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论断一出，这就有了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接下来关闭清真寺，封杀穆斯林活动，再接下来，便有了文革的疯狂与荒唐，直到1975年7月那个血色秋夜，镇压的枪声响起。

西谚云：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事实一再说明，世俗权力一旦向精神领域越位，凯撒最终成不了上帝，反而可能变成撒旦。而那种自诩科学信仰所承诺的天堂，最后，前路只能是地狱。

这就是“沙甸事件”用毁灭性灾难为我们书写的血色教训。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号

~~~~~

【乱世人生】

肖前——人民大学“文革”中一位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 陆伟国 •

肖前（1924—2007）著名哲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哲学系宗教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召集人、特邀成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肖前是人民大学“文革”时的哲学系副主任。但他在那时，除了校领导、两派头头之外，是个很有名气的人物。“文革”中，有些领导干部或出于革命觉悟的提高，或出于自我保护，或被逼无奈，甚至出于某种的不甘寂寞，出来亮相站在某派群众组织一边，结果被卷进了惊涛骇浪之中。肖前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尽管他聚焦在人们的视线里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却也是从大紫大红瞬间又跌入万丈深渊，直叫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值得一说。

1967年2月底的前后几天，人民大学发生了一些事。2月22日，校内两大组织之一的原先相对保守的“八一八”红卫兵，经过几番目不暇接的分化重组之后，又挂牌为“新人大公社”重新成立了。这在人民大学的“文革”过程中，不说是划时代也是划阶段的大事。24日，“文革”爆发前后主持学校工作的孙泐副校长，趁被看押的空隙跑出来，前往“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要反映情况，被拒绝接待。

就在这时，3月2日，肖前就贴出大字报，表示要“站出来”革命。如果这还不能引人注意，就在肖前贴出大字报的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即3月3日凌晨，“中央文革”的大员戚本禹就立马来到人民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戚本禹在大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首先就是表态支持“新人大”，说：“那时有‘八一八’‘赤卫队’，这样的组织不是革命组织，那是保守组织。后来他们造反了，表示愿意革命。这样的组织最好不要叫什么保皇派。造反不分先后，要允许他们造反”，“你们这些组织都不是反动组织，都是革命组织”。再一个要点就是明确表态支持肖前站出来，直截了当地说“肖前是个好同志”。（戚本禹讲话的其它内容，就不在本文中说了）

戚本禹这么快地肯定肖前和肯定“新人大”，当然有他的想法和安排。他是想在校里也能有一支听自己指挥的靠得住的比較亲近的队伍，比如像吴传启的学部联队那样。于是，肖前一下子就站到了万众瞩目之中。

肖前是怎么跟戚本禹扯上的呢？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63年6月16日，肖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顺应了毛泽东的想法，使他在哲学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而这篇文章的成功，是因为关锋将毛泽东说的话“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提前告诉了肖前。

关锋是“中央文革”的另一位成员，在当时也是红极一时，与王力、戚本禹合称为王关戚。而关锋和肖前，关系是很深的，都是活跃在哲学界的新生力量，都是些笔杆子。之前，他们就一起参加过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编写工作，相互比较熟悉。甚至肖前第一位夫人去世以后，第二位夫人还是关锋介绍的。

到了“文革”，因为关锋和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的成员。通过关锋，戚本禹认识了肖前。于是，肖前在3月2日刚贴出大字报表示要“站出来”革命，戚本禹立刻就来人大表

态肯定了他。这一下子，肖前成了由“中央文革”亲自点名的革命领导干部，那还了得，由此他就成了人大两派斗争中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两派都去争取他站到自己一边。

结果肖前马上表态，站在了“新人大”一边，这无疑给“新人大”增加了砝码。而且还带动了一批领导干部（如张腾霄、李焕昌等）也站了过去。肖前站队不久，就在《新人大》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揭开‘三反’分子孙泱的画皮》。“新人大”当然很高兴，不但在《新人大》报上刊登文章《彻底解放肖前同志》，还给肖前安排了副社长的职务。“新人大”和肖前都过了一段比较舒坦的日子。

这就给“三红”这边造成了被动。不过，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几个月，才半年时间，谁也没想到正在巅峰上蹦跶的王关戚竟然说倒就倒了。“三红”一下子就又有话可说了，肖前和“新人大”又被说成是王关戚的“黑爪牙”。9月4日、16日，江青连续表态支持“三红”打倒肖前。9月4日那天，江青接见北京几个高校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三红”和“新人大”都去了。“三红”是刘庆库去了，“新人大”是赵桂林去了。

江青不知是动了哪根神经，表态支持“三红”打倒肖前。赵桂林当场申辩说，肖前是戚本禹点名解放的（那时戚还没有被公开宣布打倒）。江青那个脾气，哪容得别人有不同意见，马上就翻脸，提高嗓门当众训斥：“你不要讲了，你想跟我辩论？”“你被肖前迷住了心窍，你再这样就没有资格坐在我们这个行列里。”唉，当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还真不容易。后来据说，江青是把肖前误以为是萧乾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三红”那肯错过这个好机会，还没等江青发话，9月1日，就叫李德山带人去肖前家把肖前抓到了“三红”总部（新教学大楼）。其实抓人这事本身，“三红”也没有去认真研究。那天，在“三红”总部办公室里，有人说起“关锋倒了哎，要是把那个肖前抓来，能搞出些材料来。”大家就议论那怎么去抓呢，去的人少了，抓不来；去的人多了，又会打起来。这时在场的“三红”一把手孔宪龙说，那个李德山有办法，那次就是他堆里把崔耀先救出来的。

听孔这么一说，开始提出要抓肖前的那个同学，一下就跳了起来，说：那好，我去跟李德山说。还没等别人说行还是不行，就跑出屋子，去找李德山去了。不过，李德山去抓肖前倒是很顺利，并不是因为李会武术，而是他俩是认识的。肖前是李的系主任，两人的关系还是可以的。肖前知道李对他不会怎么地，也就跟着走了。

但“新人大”这边得知后跳起来了，哪肯罢休，派人过来包围“三红”的总部大楼，想要抢回去。“三红”料到会有这一手，已经把肖前悄悄地转移到了就在总部大楼旁边的我所在的东风三楼。晚上，“新人大”来的人越来越多。“三红”怕不安全，又把他转移到了北京体育学院。因为东风三楼的南面紧靠学校围墙，来的卡车就停在围墙外。李德山他们把肖前绑了后，用床单裹了起来，叫别人看不出来，从窗户里出去，抬过了墙，运到了体育学院，放在了游泳池的更衣室里。

狗血的是，“三红”费了这么大劲转移了肖前，当晚就让他跑了。因为看守的学生没有经验，睡着了，肖前也来个翻窗又翻墙，跑了。“三红”都已经准备好第二天开批斗肖前的大会，结果人没了。有人就责怪是不是李德山有私情故意放跑的。又没想到的是，肖前第二天坐了一辆小三轮，自己回人民大学向“三红”“投案自首”来了。所以后来“三红”对肖前也没有下狠手。

知道王关戚倒了，江青也发话了，肖前保不住了，“新人大”转得也挺快。9月4日，赵桂林还当面跟江青争辩。9月11日，“新人大”就在大教室借召开“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大会”，由二把手张祖义出面说：“混进我们队伍里的肖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要说怎么变得这么快？这有什么快，那时都这样，这就叫政治，那时候的政治。由于风云变化得太快，“新人大”有点手忙脚乱，听了极左势力说“孙决是特务，是人民大学的头号敌人”，没几天，9月17日，就把孙决抓到他们总部大楼的地下室严刑拷打，结果10月6日，孙决就死在了那儿。（孙决的事情，笔者已另有专门的文章。）

但是，“新人大”还是咽不下站在自己这边的肖前翻了船的这口气。就在这10月6日，孙决死的那天凌晨，又把表态支持“三红”的党委宣传部长朱真从林园4楼17号的家中抓走。抓去以后，把朱真打得很厉害，打几十板算是轻的。

朱真曾是原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的秘书。而“新人大”认为聂真是“三红”的大后台。其实还真的不是这样。聂真在“文革”前已经调离人大去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持工作。虽然两校隔得很近，公交才三站路，但没有什么往来。到了“文革”期间，聂真对人民大学还真没起到任何作用，他自己还自顾不暇呢。相反，据我所知，站在“三红”一边的一些干部教师对聂真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不过，“三红”里有的人跟聂真比较熟，怕他在社会主义学院被对立的一派抓去挨打，要把他转移到人大藏起来，就此事问过“三红”的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也未置可否。几天后，孔宪龙和刘庆库外出路过北大，顺便进去问问他的妹妹聂元梓，看她有什么意见想法。结果，聂元梓这个人挺傲气，架子大得很，虽是第一次见面，都没请他俩坐下，就淡淡地说了声“聂真是个好人，挺老实的人”，连个“还请你们多帮忙多支持”的客气话也没有，三五分钟就走了。

后来，“三红”的人怎么把聂真弄到人民大学的，藏在了什么地方，这几个头还真不知道，也没去打听。后来聂真几个人去青岛躲了几天，对人大校内也没有什么影响。再后来，聂真被北京卫戍区关押监护，主要是因为他被认为是北方局刘少奇、彭真那条线上的人，是历史问题的原因，跟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无关，跟人民大学更没有关系。

“新人大”之所以认为聂真是“三红”的大后台，就是认为他是聂元梓的哥哥，聂元梓是“天派”的头，而“三红”算是“天派”里面的，绕了这么一圈，所以，聂真与“三红”脱不了干系，又是老干部，那就是“三红”的大后台了。有人说，孔宪龙和聂元梓曾有过多次密谋。孔宪龙说，他和聂元梓一共才见过两次，第二次是在高校学习班，也就说了几分钟的话。

朱真因为是表态站在了“三红”这边，又是聂真的秘书，也就跟着倒了霉，被“新人大”加重处罚，打成那个样，直到那年年底才放了出来。连他的夫人曲真也被“新人大”抓了过去，跟孙决夫人石崎、孙存锁的夫人等一起，关在“新人大”总部大楼地下室的“女牢”里，受了不少罪。

其实，领导干部站在哪一边，对那一派的群众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起不到什么作用。那时，群众组织正是叱咤风云，而领导干部正是冲击对象，见了人多半也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哪里还帮得上什么忙。讲到朱真也是这样。朱真在“三红”这边，评价和位置也并不高，没有发挥什么影响，大概就参加过两次会。他自己或许是因为被“新人大”抓去打过的，被迫讲过一些贬低自己、贬低“三红”的话，还在大喇叭里放了出来，在“三红”这边就低

调得很，很少出来。等人大一解散，他也就走了，离开人大这块伤心之地。即使人民大学后来恢复了，也不再回来。

0 4

“新人大”把朱真抓去打，除了出口气，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帮助，只是徒然增加双方的仇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你抓我、我抓你，你打我、我打你，不知反复了多少回。越打越厉害，能不乱吗？

直到后来，我们离校都走了，新来的工宣队更省事，干脆把肖前和朱真两人都批斗了。1968年10月26日，召开批判朱真的大会。接着11月15日，又召开批判肖前的大会。

“文革”结束后，肖老师埋头学问，潜心钻研，不提往事，在哲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很大成绩，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哲学专著。这些著作成了有关专业研究生入学试题的主要来源之一。

〔作者简介：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

□ 摘自作者回忆录《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时代作家出版社2019年出版  
~~~~~

【理论研究】

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三）

• 吴 思 •

（上接 z k 2 0 0 3 d）

2，超极权2·8版的主要特征

（1）民角的权分清单

1.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简称“四大”）。“四大”，尤其是大字报，作为民众自下而上冲击官僚集团的主要手段，可以看作革命群众在小范围内绕过权势把关人的言论出版自由。

2.革命群众的结社自由。可以成立跨行业的政治组织。

3.革命群众的出版自由。可以出版报刊，印发传单。

4.一组革命造反和专政的特权——停课闹革命、大串联、抄家、侮辱殴打甚至杀害黑五类、揪斗黑帮、揪斗关押干部，直至夺取党政财文大权。

这种政治权力及合法暴力，文革中的不同时期，分别赋予不同群体。政治罪名，也定期分配给不听话的群体。在群众专政体制下，每个革命群众都有权成为红色卫兵和思想警察。派性斗争增强了这种动机。

5. “十六条”承诺实践巴黎公社原则，民众有权提名、选举、监督和罢免官员。

6. 所谓革命群众，拥有结社和出版自由及革命特权的人群，其范围也是逐步扩大的。最初以学生为主，后来扩大到工厂农村。1966年底安亭事件之后，工人一度有权跨行业联合造反，一度出现了全国性的造反组织。

军队内部，开始不搞四大。1966年10月，中央军委允许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于是穿军装的学生加入了革命群众的行列，军队机关遭到冲击。

7. 一批因响应文革号召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得到平反，恢复了革命群众身份。

（2）官角的权分清单

与革命群众的造反特权相对应，旧的国家机器遭到全面冲击，各级干部不仅丧失了原有的部分特权，家庭财产、人格和人身安全也遭遇威胁和侵犯。在不同方面的冲击下，他们成了权利残缺的贱民。

官员集团中文化界人士，有宣扬“封资修”嫌疑的，首当其冲，被推到贱民边缘。

随后，家庭出身不好、有各种问题的官员，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整，一度被打入贱民集团。运动矛头指向当权派后，多数人的权利有所恢复。

然后，轮到了当权派和执行资反路线的工作组成员。他们遭到群众冲击和受害者的报复。

（3）顶角变迁

1. 毛泽东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超越了党组织和程序的约束。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毛泽东在评论员文章中加的一句话，在两个月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全党：“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这就赋予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的权利，剥夺了党组织和官僚集团以纪律之名推行不符合毛意愿的政策的权利。

毛泽东超越组织、制度和纪律的制约，凌驾于党政组织及合法程序之上，拥有了超极权三角的合法建构权。在这个三角中，毛泽东把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他本人直接控制的临时指挥机构，绕开了政治局和国务院等正规权力机关。

2. 毛泽东思想升级到一个新高度，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套理论的新内容，体现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六条”“五七指示”和报刊上随时发布的最高指示之中。

这套理论自1956年开始酝酿，1964年基本形成，文革付诸大规模实践，十年间有多次修改深化。

（4）超极权三角之外的贱民

1. 传统贱民

1967年1月发布的“公安六条”第四条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

2.新增的贱民和准贱民

在地富反坏右等传统的阶级敌人之外，民角方面增加了黑帮。官角方面，“走资派”，有走资派嫌疑的当权派，刘邓试图控制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人员，一概“靠边站”。他们可能属于敌我矛盾，也可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敌我矛盾自然出局，沦为贱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犯了路线错误，其权利也被部分剥夺，也可以被揪斗。他们在边缘地带听候发落。

（5）经济：大庆大寨模式

毛泽东曾在“九大”描述文革前的工业领域：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不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提倡铁人精神，一再如军队那样搞“大会战”的大庆模式，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模式，一直是超极权各个版本的标准配置。

文革结束前后，学大寨运动扩展为普及大寨县运动，大寨县的样板昔阳县从小队核算向大队核算过渡，大寨大队则向公社一级的所有制过渡，走向一大二公。大寨模式也在逐步升级。

3，版本难题

超极权2·8版的难题在于，“十六条”既要求实施巴黎公社原则，又要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十六条”第9条规定：革委会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

第16条同时规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按照超极权2·8版的设计，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普及，民众意志逐步向领袖意志靠拢，最终趋向融合，统辖官僚集团，逐步走向超极权3·0版。在领袖意志与民意融合之前，超极权2·8版的领袖角在上，民众角居侧，官员角在下。

“十六条”没有说普选适用于哪一级。如果适用于省级，那么，普选出来的官员，到底服从毛泽东，还是服从选民？如果服从选民，那么，民众与毛泽东的意志有多少差异，省级干部与毛泽东也会有相应的差异。

只有在民众思想与领袖意志完全一致的条件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才能与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统一起来。否则，必须有一方让步。

“十六条”第九条说，革委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意味着巴黎公社原则要向毛泽东思想让步，党可以取缔巴黎公社。

（三）超极权 2·5 版：军管新秩序 四次调整左右边界

1，主要时段和标志性事件

本版的大致时段在 1967 年 2 月—1967 年 8 月，从上海公社改名，到打倒“王关戚”。

（1）放弃巴黎公社原则

上海公社宣布成立一周之后，1967 年 2 月 12 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主要谈上海公社问题。毛泽东说，成立公社牵涉面太大，涉及整个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外国承认问题。……如果都叫公社，党放在哪里？公社不能代替党。毛泽东建议上海公社改称革命委员会。

在此前后，1967 年 2 月 11 日和 16 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多位军政要员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争吵，焦点之一就是要不要党的领导，巴黎公社原则与党的领导及军队的关系。这两场发生在怀仁堂里的争论，史称大闹怀仁堂，又称二月逆流。

同样在 1967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取缔了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等全国性的经济主义组织。当时，“经济主义”即福利要求正在各地民众中涌动，上海的财政和银行难以承受，民众诉求与领袖意愿差距甚大。

毛泽东要求上海公社改名，向党的领导让步，意味着超极权三角形态的重大调整。原来设想的 2·8 版，在建构过程中已经降到民角略高于官角的 2·6 版，但这种形态也遭到民众和官僚集团的双重挑战。民众意志距离领袖意志比预想的更远，官僚集团包括军方的反抗比预想的更激烈。毛泽东压民抬官，放弃了实施巴黎公社原则的承诺。

1967 年 9 月 24 日，周恩来接见外贸口各革命组织代表时说得更明白：现在一下子就搞巴黎公社选举，势必发展无政府主义。周恩来在接见造反派代表时还说：巴黎公社原则滥用就成了自由化了。

此阶段过后，民众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追求，被迫转入地下。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主张，被当作无政府主义的极左主张，遭到严厉批判，代表人物被捕入狱。

（2）实施军管

夺权之后，造反派普遍陷入权力之争，山头林立，局势混乱。军方于 1967 年 1 月下旬宣布介入文革，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

（3）放弃巴黎公社原则之后，毛泽东强调大联合、三结合：首先各派革命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然后，各方协商，由党政干部、当地驻军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共同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作为临时权力机构；最后，获得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走完上一步，才能走下一步。

（4）权分边界的四次调整：一打左，二限右，三打右，四限左。

一打左：二月镇反。毛泽东授权军方开枪，军方镇压“反革命”，造成重大伤亡。中央军委下达《军委八条》，大批造反派头头被抓。

二限右：四月平反。军方二月镇反，对左翼压制过度，毛限制军方，发布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释放了被抓的造反派头头，为造反派平反。

三打右：毛泽东试图促成以左派为主的“大联合、三结合”，但军方在主导“大联合”时普遍打压左派、支持右派，左右之间发生武斗。毛泽东赴武汉抓点，1967年7月20日，武汉保守派扣押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冲击毛泽东住处，酿成“七二〇事件”。毛泽东号召武装左派，中央文革号召抓军内一小撮，军方大受冲击，武斗加剧。

四限左：1967年8月，面对武斗前景和军方抗拒，毛泽东下令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关锋隔离审查，禁止揪“军内一小撮”。

（5）1967年8月4日，毛泽东从武汉退到上海后，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造反派发动的武斗。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调集十几万人，手持棍棒长矛，围攻对立面“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大获全胜。毛泽东称赞冲锋者勇敢，默许了武力解决派系斗争的方式。

本阶段的主题是：尝试建立三结合政权，确定并调整军方作为主导者的权分边界。

2，超极权2·5版的主要特征

（1）民角的权分清单

1.四大权利。

2.革命群众的结社自由大体保留，但是受到限制和规范。

1967年2月，中共中央取缔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

3.革命群众的出版自由依然存在，但内容受到限制。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对群众组织小报控制的通知：（1）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要参照两报一刊的精神进行宣传。（2）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不要擅自刊登。（3）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4）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5）不要搞《黄色新闻》以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6）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

4.明确放弃巴黎公社原则——选举监督和罢免官员。巴黎公社普选原则，下降为部分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三结合入阁权。他们可能是本组织选举出来的，但也要得到主导大联合、三结合的军方及其他参与方的认可。

5.保留部分革命特权——抄家、揪斗关押干部、夺取党政大权。

但是，军管的地方禁止夺权。已经夺过权并得到革命领导认可的地方禁止再次夺权。禁止夺外交权。（11）春耕期间农村不能夺权。（12）禁止冲击军事机关、公安机关、档案和机要部门。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造反派一度获准“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在全国各地冲击军区，揪“陈再道式的人物”，造反特权再次可以用于军队。军方怨气冲天。这种特权随着王、关、戚倒台而被取缔。

1967年3月，毛泽东要求停止大串联。“停课闹革命”改为“复课闹革命”。中共中央要求支援边疆内地和三线的职工返回工作岗位，上山下乡知青回到农村。不过，由于军方“二月镇反”和随后“四月平反”来回折腾，上述要求实施不力。

6.革命特权中的武斗权和持枪权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观看上海工总司围攻反对派的武斗实况，同日致信江青，谈到武装左派，还谈到群众专政。毛泽东认为，75%以上的部队干部支持右派。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一些地方造反派发枪，武斗升级。

7.群众专政

1967年年初发布的“公安六条”规定：“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革命群众有权对“说错话”的人实施隔离审查，办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班，以批斗、游街示众等方式侮辱人格、伤害人身，等等。群众专政是中共土改时实行的老传统。

1967年7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专政是群众的专政”。〔13〕8月，毛泽东认为，公检法不可靠了，要搞群众专政。于是各地普遍私设公堂。〔14〕

武装左派，群众专政，近乎另建国家机器，而且是一套更加没有规矩的国家机器。民角提升为准官角。

总体看来，除了明确放弃巴黎公社原则之外，超极权2·5版的民角权分略见缩小，革命特权受到了许多限制。新增权分，“揪军内一小撮”和持枪自卫权，引起军方的激烈反弹，加剧了局势动荡。

（2）官角的权分清单

1.军管

1967年1月2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下发，宣布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作废。3月19日，《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下发。军方大规模接管各地各部门的党政大权，维持秩序并主导政权重建，促进大联合、三结合，筹备成立革委会。

于是，军队直接成为政权，政权成了军政府。

2.开枪权、逮捕权和取缔权

1967年1月23日颁发的《支左决定》第三条授权军方：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他们动武就还击。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颁布毛泽东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要求：“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2月上旬，毛泽东授权军队在遭到右派群众组织冲击时开枪自卫。

但是，谁是右派，谁是反革命，什么算动武，什么算冲击，定义很模糊。于是，军队获得了条件模糊的镇压权和开枪权。各地军方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镇压造反派，大规模抓人，开枪杀人，取缔造反派组织。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队提意见，或对本地区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强调“不准随意捕人。逮捕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要经过批准手续。”“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群众组织，即使是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也不准开枪。”

这一轮放权和收权引发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和“四月平反”。四月平反之后，军队镇压减少。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军方后退到位，再无任何组织被定为保守组织。打倒王关戚之后，造反派无权“抓军内一小撮”，也后退到位。新的均势形成。

3.解放干部

1966年8月，“十六条”公布之后，第一批遭到冲击的干部，就是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当权派和工作组成员。他们处于贱民的边缘，权利残缺。

1967年全面夺权之后，毛泽东强调三结合，要求“不再提资反路线，不再揪斗工作组人员”，这批干部当中的许多人恢复了革命干部的一般权利，时称“解放”。

原来的一些当权派，获得了三结合进入革委会领导班子的权利，有望恢复职权。领导干部人数有限，三结合又必须有他们参加，于是各派争抢，领导干部的处境大为改善。

总体看来，军队式的命令秩序架构进一步强化了，官角的权分增加了。

（3）顶角变迁

1.批评毛泽东者，一概视为现行反革命

“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2.灵魂深处闹革命

夺权开始之后，一方面各派争斗不休，大联合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新的掌权者地位发生变化，开始蜕化变质。毛泽东提出的对策是灵魂深处闹革命。

1967年2月1日，毛泽东推荐《红旗》转载孟繁华的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编者按”转达了毛泽东的话：

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夺走资派的权，也必须夺自己头脑里资产阶级思想的权。只有夺了自己头脑里资产阶级思想的权，让毛泽东思想占领阵地，才能形成步调一致的革命队伍。否则，即使夺了走资派的权，也不能巩固，还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权。

编者按说，一些革命造反派队伍在夺权中暴露出来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有一个总根子，这就是“私”字。

打倒“私”字，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至此，毛泽东思想升级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新版本。超极权意识形态试图造人性的反，造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一代新人。

3.个人崇拜仪式

个人崇拜仪式包括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等。个人崇拜的标语画像在全国造成一片“红海洋”。

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天天读”雷打不动。背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五篇”，“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活动席卷全国。

（4）超极权三角之外的贱民

除了“公安六条”开列的贱民，官角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等，本阶段常用罪名是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

如前所述，反革命的判定权一月份交给各地军方，四月之后又收归中共中央。收权后，许多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得到平反。

本阶段新增了经济主义罪名，取缔提出这种要求的权利，并取缔了一些组织，抓捕了一些人。

3，版本难题

本阶段，在三结合的入阁竞争中，毛泽东指定的规则大体是革命群众组织协商与委任制相结合。这里蕴含着三种竞争规则，按照重要性排列如下：

第一，必须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上级领导的批准。

第二，必须是革命群众组织。不革命的组织，不仅没有协商资格，还可以被取缔。革命群众组织有权对其文攻武卫。

如果缺乏判定群众组织性质的权威，彼此都认定对方是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就会出现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很容易导致暴力争斗。如果难以判定谁打响了第一枪，文攻武卫很容易走向武斗。

第三，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实现大联合，然后通过协商谈判的办法，确定群众组织代表的入阁名额。

三种规则，导致三种竞争策略，导向三种秩序。

第一种，上级委任制引来对上效忠策略。无论真假，必须高举忠于毛泽东的旗帜。但这种策略能否导向大联合、三结合，还要看其他策略的成本和收益。

更复杂的是，毛泽东本人有时偏向左派，有时支持右派，上级本身也处于分裂状态。换一个角度说，上级是可以服从的，也是可以反对的，上级委任规则和对上效忠策略是可以伺机抛弃的。

第二种，如果没有权威确认群众组织的革命性质，这种无政府状态将导致暴力竞争。暴力竞争的双方，如果不能接受沦为贱民的命运，必定拼命奋战。

如果顺其自然，通常要在很久之后，在双方力量耗尽、厌战情绪压倒斗志之后，合作谈判才能开启。在确认暴力竞争的收益不如妥协合作之后，和平才有望恢复。如此形成的合作格局也是脆弱的。

第三种，协商谈判。

按照“十六条”的规定，革委会委员本来要由群众选举产生。在选举条件下，如果采用简单多数决定的规则，通常会出现两大党派。在中国当时那种贫富和利益分化并不严重的社会中，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政治主张将趋向中间。这就是说，假如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得以实施，反对派的基本权利也得到保护，那时，各派将靠拢合作。当然这需要多次反复。

同样在选举条件下，如果采用比例代表制的规则，政策趋同的压力就会下降，但百分比的限额将决定党派的数量。假如限额为选票的5%，两党制就会变为多党制，多个大小党派将在议行合一的革委会中合纵连横，讨价还价，争夺权力，不会发展为武斗。

毛泽东否决了巴黎公社的普选规则，“十六条”规定的选举落空。替代办法是各派代表的协商谈判。毛泽东设置了不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就不能组建革委会的条件，谈得成可以双双入阁，谈不成就反复谈。

大联合、三结合的协商谈判，主要在权力分配问题上讨价还价，各派之间讨价还价、各派内部的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不成还可以武斗，武斗不合算再重新谈判。中央出面协助排斥各方的强硬派，让温和派彼此妥协，这种努力有成有败。

当时的社会秩序，恰好反映了上述混乱：规则的混乱和规则初试的混乱。毛泽东不能接受有助于各派趋同妥协的选举规则，也没有彻底排除暴力竞争规则以减少规则的混乱，但又没有时间和条件容忍长期混乱。

（四）超极权 2·4 版：大办学习班 大联合三结合难产

1，主要时段和标志性事件

本阶段的大致时段在 1967 年 9 月—1968 年 7 月，从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号召大联合，到镇压武斗的“七三布告”发布前夕。

（1）1967 年 9 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号召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表示文革要在 1968 年春季结束。

（2）毛泽东 9 月底巡视返京，立刻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将领，包括武汉的陈再道，多有勉励之词。“揪军内一小撮”在各地受到严厉制止，稳住了维持基本秩序的最后力量。

（3）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皆被捕入狱，下属被清洗。中央文革小组系统受损。

（4）全国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毛泽东先后将各省三结合的各派人马招到北京办学习班，“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促进大联合、三结合。

（5）创立“五·一六”罪名。

（6）1968 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

（7）各地发枪、抢枪，武斗规模升级。

（8）经济下行，财政困难。

由于经济社会秩序混乱，1967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1966 年下降了 9·6%。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 13·8%，农业总产值增长 1·6%。

1968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

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冻结 1967 年年底各项经费和资金的结余存款。

本阶段，民角和官角的权分边界开始重新划分，但尚未强制实施。本版与下一个版本的最大区别，在于号召与强制，名义与事实。

2，超极权2·4版的主要特征

（1）民角的权分清单

1.四大权利。

2.结社自由受限。

196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求所有群众组织按照系统、行业、班级实现大联合，以利于实现三结合。

官方有意铲平山头，解散派性组织。当然，要求不等于强制。

3.内容受到限制的出版自由仍旧。

4.压缩革命特权：再次强调停止大串联和复课闹革命的要求，并付诸实施。

5.持枪权和文攻武卫权一度扩展。

6.三结合入阁权

部分群众组织的代表依照三结合原则，经上级批准，进入了革委会。不过，他们的人数、实权和作用远不及军人和官员。

7.击右倾翻案风

1968年5月17日，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划时代的文献》一文。毛泽东审阅时，加上“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王关戚倒台后，中央文革权威受损。保守派试图更进一步，为二月逆流翻案。这被看作阶级斗争新动向。

给对方设置一个罪名，相当于自家装备了新的进攻武器，权分因此扩大。

总体看来，民角权分继续缩小，主要是在名义上。

（2）官角的权分清单

1.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意见。在革委会中建立作为领导核心的党的核心小组。在基层，整顿并恢复党支部和党小组。

2.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1967年5月至8月，“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散发传单“炮打周恩来”，称其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

毛泽东将“五·一六”定性为反革命集团。1967年9月初，江青宣布了“五·一六”的三大罪状：第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是抓军内一小撮，毁我长城。第三是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即反对三结合新班子。

这套罪名设置，照顾了三方利益：周恩来所代表的革命干部、军方和中央文革。在抓“五·一六”的旗号下，三结合中的三大利益集团联手，在未来数年中抓人数百万，整人上千万，沉重打击了造反派势力。

不过，在1967年8月之后的一年间，“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罪名，主要还是建立并维护三结合秩序的备用武器。当时只逮捕了“五·一六”兵团的学生领袖，以及中央单位少数几位被称为“黑后台”的著名左派，那些与“王关戚”关系密切的人。

3.清理阶级队伍。

毛泽东1967年9月视察大江南北时指示，右边要对付走资派和保守派，左边要对付群众组织里的坏人，对付无政府主义。

1967年11月，江青在讲话中谈到清理队伍，号召抓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揪出造成两派不和的黑手，促进大联合三结合。

1968年1月初，北京院校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所谓黑五类分子、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坏头头等，被成批揪出来。

根据毛泽东1968年5月19日的批示，中共中央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转发全国，要求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旋即在全国展开。夏季进入高潮。

4.批判极左思潮

所谓极左思潮，又称新思潮，其核心观点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官僚特权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解决这个矛盾。

湖南“省无联”的思想家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中指责“三结合”是改良主义。三结合把倒台的官僚们扶起来，必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红色资本家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因此需要继续革命。

这些主张超出了毛泽东的超极权设计，被称为极左思潮。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都有极左派，但这些派别组织遭到了批判或镇压。杨曦光被捕入狱，获刑十年。《中国向何处去》遭到全国性批判。

（3）顶角特征

1.毛泽东号召大联合三结合，限制左右两边，超极权的人事调整和制度建构告一段落。超极权建构转向思想领域。

2.斗私批修。

林彪在1967年国庆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

3.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在国庆讲话中，林彪要求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林彪说：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

1968年1月1日，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

3，版本难题

本来，毛泽东想让民众在超极权三角的圈子里互动，大命令，小自发，自发生成一种秩序，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但是，自发互动的结果是“全面内战”。造反派和保守派武斗，保守派垮了，造反派分裂成大小山头继续武斗。

为什么？前边讨论了互动规则问题。投票规则有可能造就大联合的秩序，但这个规则被废除了。法制，严禁暴力，可以维护和平，也被废除了。

毛泽东的看法是有坏人。1967年9月，张春桥在接见江苏两派代表时引毛泽东的话说：工厂分成两派，死活对立，不外三个原因：走资派挑动，有人操纵；造反派内混入坏人；造反派头头私心杂念，以我为核心。所谓私心杂念，毛泽东又称之为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反正不是无产阶级思想。

按照这种逻辑，官方的对策是：在右翼抓走资派，在左翼抓“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同时进行思想教育，实在不行就解散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的对策是：上纲上线攻击对

方，抓对方的坏人，将对手赶出超极权三角。如果可能的话，干脆武力消灭，像王洪文在上海所做的那样。

至于解散组织，回归本系统和单位，本来就依托体制的保守派并不在乎，造反派则坚决抵制：回归体制意味着自我削弱。

如此规则，如此对策，很难生成毛泽东希望的那种“团结胜利”的新秩序。

换一个角度看，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武斗有其必然性。

首先，确实有造反派和保守派，各派内部也难免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于是每个选择关头都会出现政策之争，都可能出现分裂。

其次，即使没有政见分歧，在政治组织发育的初期，也会出现大量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帮派式组织，人们跟某人、反某人，抱团取暖，争取自身利益。

第三，群众组织背后还有分裂的上级支持者。他们要利用群众组织保护或争取自身利益。

第四，两派一旦开打，冤冤相报，互动升级，自然陷入恶性循环。

最后，企事业单位的群众组织分裂武斗，无须像乱世那样自筹粮草，脱离生产也可以领工资。闹革命的经济财政门槛很低。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解读下，这些政策和利益之争，上升为阶级和路线之争。武装左派之后，又升级为生死之争。

（未完待续）

□ 来源：《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四）》，美国华忆出版社，2019年11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